

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理论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批判

王云凤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9日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在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 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风险。以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理论为分析框架审视,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异化逻辑非但没有消解, 反而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呈现出新的形态, 从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扩展至认知架构层面的主体性危机, 从显性转向隐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类主体倾向、算法权力对劳动过程的深度规训、数据垄断对分配格局的系统扭曲, 共同构成人工智能的技术异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独特价值在于, 穿透技术中性的表象, 将批判矛头直指技术背后的生产关系, 从而为超越异化开辟出实践创新的辩证道路。

关键词

技术异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工智能伦理

Critique of AI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Yunfeng W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4, 2026; accepted: May 26, 2026; published: June 9, 2026

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hile propelling a leap in productive forces, has simultaneously engendered profound ethical risks. Examined through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arxist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e logic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in the age of AI has not dissolved; rather, driven by capital logic, it has assumed new forms—extending from labor alienation in the spher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o a crisis of subjectivity at the level of cognitive

architecture, and shifting from explicit to implicit manifestations. The quasi-subjective tendencies of generative AI, the deep disciplinary regulation of labor processes by algorithmic power, and the systematic distortion of distribution structures by data monopoly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specific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distinctive value of Marxist critique lies in its penetration of the facade of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directing its critical thrust at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underlying technology, thereby opening a dialectical path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toward overcoming alienation.

Keywords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Marxist Philosophy, AI Eth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深度神经网络驱动的图像识别到大型语言模型支撑的内容生成，从平台经济中的算法调度到公共治理领域的智能决策，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乃至存在方式本身。然而，与技术进步相伴而生的是一系列亟待回应的伦理难题，这些问题不仅触及技术应用层面的规范问题，更指向人类在智能时代如何安顿自身主体性的根本追问。当前，后果论与义务论框架下的 AI 伦理研究，为隐私保护、算法透明等设置了重要护栏。而以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则深刻揭示了平台资本对行为数据的改造与掠夺。然而，这些批判多在法与权利的层面展开，尚未彻底追问：为何旨在解放人类的技术，会系统性地转化为异己力量？这便凸显了马克思技术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它穿透技术中性的表象，直指决定技术应用形态的生产关系根基，从而使批判从道德呼吁升维为对现实经济基础的重构诉求。

2. 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与核心内涵

2.1. 从劳动异化到技术异化

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理论植根于其劳动异化学说。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的四个基本规定性：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身就越贫穷；劳动者与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被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异化劳动生产出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关系[1]。

马克思从未将异化现象抽象地归咎于技术或机器本身。在《哲学的贫困》中，他明确批判了经济学家将机器视为价值中立工具的倾向，强调必须看到机器背后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2]。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技术异化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被纳入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技术异化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他以机器大工业为分析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内在矛盾：机器本应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使劳动更有成效，但在资本主义应用中，机器却成为延长工作日、强化劳动强度、使工人从属于资本的手段。劳动资料以作为机器出现成

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3]。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的发展导致“死劳动”(物化在机器中的过去劳动)对“活劳动”(工人当下的劳动)的支配关系，这一“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在技术形态上的表现，构成了技术异化的核心机制。

2.2. 技术异化的双重属性

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理论最富张力的部分在于其辩证法品格。马克思从不否认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描绘了自动化生产体系在消灭直接劳动后可能带来的自由前景：当劳动不再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直接器官，人将以监督者和调节的身份置身于生产过程之旁，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4]。这一前瞻性论述为人工智能的解放潜能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马克思同时清醒地看到，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技术进步的实际后果恰恰走向其反面。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驱使技术沿着特定轨道运行，使技术从解放人的工具异化为压迫人的手段。这一矛盾并非源于技术发展的必然逻辑，而是源于资本主义应用技术的特定方式。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有一段论述，可作为理解这一辩证法的关键切入点，人类凭借科学与创造力征服自然力的同时，自然力也会反过来对人类施以报复人们越是深入地利用自然力，就越会陷入一种实质上的支配之中，无论社会组织形式如何[5]。技术一旦被嵌入特定的权力结构与利益格局，便可能转化为一种异己的支配力量。这一洞见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展现出极强的解释力。

3. 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异化论透视

3.1. 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

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会挑战既有的人类价值，促使人类去重新思考人类的基本属性与伦常关系[6]。从基础研究到产品落地，从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资本逻辑始终发挥着根本性的塑造作用。大型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研发的主导、风险投资对技术路线的引导、市场逻辑对应用场景的选择，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人工智能“为谁发展、向何处去”的根本方向。

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研发导向层面，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化往往优先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非社会福祉的最大化。推荐算法的设计目标是用户停留时长与广告转化率，而非信息质量或认知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迭代方向是商业场景的可变现性，而非对人类创造力的真正赋能。第二，在资源配置层面，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其采集、标注、处理的全过程被少数平台资本所垄断，形成了新的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三，在应用后果层面，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被用作压低劳动力成本、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工具，而非减轻劳动负担、拓展自由时间的手段。

马克思揭示的“机器支配活劳动”规律[7]，在人工智能时代正经历从体力节律规训到认知可能性预设的本质跃迁。物化于大语言模型中的庞大数据，作为人类过去的集体智力产物，如今正反过来框定着当下活生生的主体的认知视野。这种认知异化具体表现为：在过程中，将主动的探索简化为被动的指令接收；在产品端，将凝结独特经验的创造简化为可无限重组的概率输出；在关系上，以无摩擦的拟像交往侵蚀真实的互为主体的能力。其剥削的隐秘性正在于，它驯化的不再是外在的纪律身体，而是内在的欲望与思维框架本身。

3.2. 劳动异化的数字升级

劳动过程的异化在智能算法的规训下呈现出新特征。以平台经济中的外卖骑手为例，算法系统通过对配送路径的实时优化、送达时间的动态压缩、奖惩机制的精密设计，将劳动者的行为轨迹转化为可计

算、可预测、可控制的数据流。劳动者看似获得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实则被更深地嵌入算法设定的时空纪律之中。这些劳动新异化的根源在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消除新异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回归作为劳动工具的本质，成为服务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8]。

劳动产品的异化在数据资本主义中获得了更深刻的实现形式。在工业时代，劳动者与产品的分离表现为工人生产的商品归属于资本家。在数字时代，劳动者生产的数据、内容、关系网络也同样脱离生产者，成为平台的垄断性资产。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文字、图片、视频，在知识社区贡献的回答、评论、标注，在搜索引擎上留下的每一次点击和停留，这些数字劳动的产物不仅无偿为平台所占有，还成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原材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对劳动成果的剥夺。

人的类本质异化在算法社会中被推向新的维度。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活动视为人的类本质特征。然而，当算法推荐系统持续强化用户的认知偏好，信息茧房导致思想视野的窄化；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创造性表达简化为提示词的输入与输出的接收，写作、绘画、作曲等自由创造活动被降格为对模型能力的调用，人的主体性活动正在经历一种深层的异化：不是从劳动产品中，而是从思维方式与认知结构本身中被异化。

3.3. 主体性危机

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理论对人工智能伦理最为深刻的批判，指向技术对人之主体性的根本挑战。这种挑战并非科幻叙事中的“机器人统治人类”，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悄然发生在每一次算法推荐塑造我们的偏好时，在每一次智能助手替代我们的判断时，在每一次人机交互模糊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时。

创造性劳动被异化为概率运算。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海量人类作品为训练数据，通过统计规律模拟创造性产出。在这一过程中，创作活动从主体与世界的独特遭遇中抽取出来，被还原为概率分布的参数优化。创作者在人机协作的表象下，可能逐渐丧失对创作过程的主导权，甚至丧失对“何为创作”的判断力。伦理决策中的辩证张力被消解。真正的道德抉择发生在价值冲突的情境中，要求主体在矛盾中权衡、在不确定中承担决断的责任。然而，基于统计模型的人工智能伦理决策将价值问题转化为优化问题，预设的效用函数下计算最优解，这一过程恰恰规避了伦理抉择中最具主体性的环节：对价值本身的审视与重估。主体间性的真实性在拟真交互中瓦解。大型语言模型能够生成高度拟人化的对话文本，甚至模拟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当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非人类的智能体进行“交流”，对话的对方却并无真正的理解与意图时，一种新型的交往异化便产生了：看似丰富的社会互动实则是对主体间性的模拟，它可能使人逐渐模糊真实关系与虚拟交互的边界，钝化对真实人际交往的需求与感知。

马克思在揭示的“死劳动支配活劳动”规律[7]，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了认识论维度的跃迁。当深度学习模型将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转化为可计算的向量，并以更高的效率重新组合输出时，剥削关系便从对劳动时间的占有转向对认知框架本身的殖民。这已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剥削，更是一种存在论层面的支配：资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试图将人类心智活动的全部领域纳入其增殖逻辑的掌控之中。

4.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解放向度与路径探索

4.1. 回归人的主体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既可能成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也蕴含着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潜能，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理论框架下的两个侧面。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例，马克思曾分析自动化生产体系，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超越，技术发展就能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由前景[4]。到那时，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生产逻辑将自行瓦解；物质生产本身也会摆脱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人不再是生产线上被动的执行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旁边，扮演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角

色。真正构成财富基础的，既不是人亲手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人对自身普遍生产能力，即由科学技术所发展出来的整体生产力的占有。这一思路对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同样适用：AI对人类智能活动的模拟与放大，恰恰提供了把人从重复性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可能。但这一解放潜能的实现，必须以深刻的社会条件变革为前提，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必须被打破，技术发展的目标必须从为资本增殖服务，转向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不是要拒绝人工智能技术，而是要拒绝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这意味着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必须展开对技术发展方向、所有权结构、治理机制的系统性重构，使技术真正回归其作为人类能力延伸与放大的本质。

4.2. 生产关系变革与建构的协同推进

在经济层面，必须打破数据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资源，其社会属性要求相应的社会化管理方式。数据公地治理模式，通过集体协商、公共信托、数据合作社等机制确保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同时，算法作为组织社会生产的核心工具，其所有权与控制权不能完全交由私人资本，而应建立公共审查与民主参与的治理机制。法律层面，需要重塑劳动权利保护体系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态变迁。平台劳动者的算法管理权、离线权、算法解释权等新型权利应纳入劳动法保障范围。对于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版权问题，应建立既能激励创作又能保障数据贡献者权益的法律框架。在技术伦理层面，算法民主化是打破技术异化的重要路径。这包括：在算法设计阶段引入受影响群体的参与，在算法运行阶段建立透明性与可解释性标准，在算法评估阶段嵌入社会公平与人的尊严等价值维度。技术伦理不能停留于事后补救，而应成为技术研发全过程的内在构成要素。在教育文化层面，培育具备批判能力的数字公民是抵抗技术异化的长远基础。这要求教育不仅传授技术使用技能，更要培养对技术社会影响的反思意识、对算法逻辑的解构能力、对自身数据权利的自觉维护。只有当公众能够批判性地理解人工智能的运作机制与权力效应，技术才不至于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神秘力量。

参考文献

- [1] 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 卡尔·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 [3]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5]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6] 孙伟平. 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J]. 哲学研究, 2017(10): 120-126.
- [7]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8] 肖峰. 数字技术资本化与劳动新异化[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5): 121-132+156.